

代史學會會長，《創作與批評》的主編，主要從事近代東亞的文化認同和中、日、韓三國的亞洲觀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回歸東亞：探索中國的現代性》、《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覺的歷史與實踐》、《在核心現場重新看東亞：為了共生社會的實踐課題》等。]

什麼是好的歷史研究：以蔣介石研究的三個面向為例

陳紅民

(浙江大學 人文學院 歷史學系，浙江 杭州 310028)



為了準備“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論壇，筆者做過兩次小的訪談：一次是2013年春節期間去探望著名的史學家——南京大學茅家琦教授（他是筆者的碩士生導師，也是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裴宜理教授在南京大學訪學時的老師）。茅教授已經八十七歲，仍然筆耕不輟。當筆者請教他“什麼是好的歷史學”時，他的回答是，還是要回到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筆者又請教他對蔣介石研究怎麼看，他說，做這個課題沒有意思，太小了，就是弄清許多歷史事實也沒有意義，還是要從大歷史着眼。另一次是為新入學的歷史學系博士生開設的“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第一堂課上，筆者請學生回答“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問題，學生普遍的反應是驚詫：老師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無人回答。筆者只好換個角度提問，你們未來都要寫博士論文，那你們認為什麼是好的博士論文，並逐個詢問，多數學生還是惘然以對。有個學生說，判斷好不好的標準是由大專家們或學術刊物制定的，他們說是好論文自然就好。祇有一個學生說到，好論文應該用新史料，新方法（可能是受上課時的特殊語境啟發）。這兩次訪談，讓筆者感慨良多：在茅家琦教授那裏，過去他是以做實證研究具體問題、並且強調用檔案出名的，記得他教導我們，祇要材料過硬，別人就無話可說；而今我們照着他的教導去做時，他已對此不以為然；這反映出，即使是優秀的學者，“什麼是好的歷史學”的標準也會改變。在學生這邊，當進入到博士學習階段時，還沒有想到過“什麼是好的歷史學”這個問題，如果沒有理論的引領，沒有問題意識，未來是很難能做出好的論文的。當然，由於“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問題涉及歷史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功能，涉及歷史學研究成果的表述方式、史觀等諸多方面，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目的會給出不同的答案，所以，筆者在此祇能以目前進行的蔣介石研究為例加以闡述。

1949年至今的六十餘年，中國大陸對蔣介石研究的基本軌跡經歷了從一個“蔣介石”到三個“蔣介石”的過程。1949—1978年，由於受到現實環境/政治控制的影響，強調“史學研究為政治服務”，“革命史觀”一統天下，“蔣介石”長期是作為革命對象的象徵而存在的，史學界的“研究”更多是對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①中的結論進行註解。1978年

①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之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兩岸關係的解凍及新史料的出現，關於蔣介石的學術研究漸趨活躍，原來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險學”變成了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其中的“顯學”。這種基於新的史觀、新的史料的學術研究，解構了原先那個作為政治符號的蔣介石，正在重構一個接近歷史真實的蔣介石。最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因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新媒體的出現等，對蔣介石的關注呈現出越來越多元化的趨勢，人們可以更多元地考慮問題與表達意志；一部分民衆為了發泄不滿情緒，甚至有選擇性地羅列史實，在互聯網上尊稱蔣介石為“蔣公”，列出其“歷史功績”，但缺乏全面客觀與理性分析。如此一來，現時的中國實際上是存在着三個層面不同的蔣介石研究或者蔣介石形象，即“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境下的蔣介石、學術研究中的蔣介石與網絡公眾層面的蔣介石，它們分別對應政治宣傳的史學、史學研究與公眾史學。由於三個“蔣介石”各有其背景，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很難相互取代或用“最好的蔣介石研究”統一標準來覆蓋。但是，從事三個“蔣介石”研究的人，未來都有如何深入研究，更加學理化，以理服人，進而將自己的研究做得更好的問題。

（一）主流意識形態層面的蔣介石

在中國大陸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意識形態的印痕還是相當深刻的。被列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全國統一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雖不是專論蔣介石的，但對蔣介石有一些定性的描述，可以幫助人們瞭解現階段“革命史觀”之下的“蔣介石形象”。試舉兩例：

1. 蔣介石是大革命時期的“投機者”：

北洋軍閥勢力的迅速崩潰，使帝國主義列強感到震驚。它們在中國集結兵力、製造事端，企圖以武力相威脅，阻擋中國革命前進的步伐；同時開始把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看作國民黨內的“穩健派”，進行拉攏。周恩來說過，蔣介石“雖曾組織黃埔軍校，指揮北伐，但他的軍閥思想和投機思想卻與他‘參加’革命相隨而來”。在大革命初期，他“起了一般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作用”。1926年3月，他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打擊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他的立場就轉到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變為新右派”。……

1927年英美製造的南京事件加速了蔣介石同帝國主義勢力勾結的步伐。^①

2. 蔣介石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妥協者”：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集團在決心抗戰的同時，卻又害怕群衆的廣泛動員可能危及自身的統治，因而實行的是片面抗戰的路線，即不敢放手發動和武裝民衆，將希望單純寄託在政府和正規軍的抵抗上；在戰略戰術上，沒有採取積極防禦的方針，而是進行單純的陣地防禦戰。這就使得大多數作戰未能給敵人以更大的消耗，並在短時間內喪失了大片的國土。^②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本對國民黨政府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國民黨在重申堅持持久抗戰的同時，其對內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蔣介石將抗戰到底的含義解釋為“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這標誌着國民黨由片面抗戰逐步轉變為消極抗戰。^③

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以後，由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團結抗戰的局面逐步發生危機，出現了中途妥協和內部分裂兩大危險。針對這種情況，中共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降活動，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抗日。^④

^{①②③④}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沙健孫、馬敏主編，第119、149、150、155頁。

在此，可以與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對蔣介石的評論做一比對：

1. 蔣介石在大革命時期“篡黨篡軍篡政”：

(蔣介石利用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竊取了國民黨黨權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介石歷史的過程是：經過篡軍（第一軍）以篡黨篡政，現在又再經過篡黨以進一步地篡軍篡政。蔣介石企圖在這個“總司令”的名義下，形成一套完整的軍事獨裁。……這一切軍事獨裁的規模，實際上乃是大資產階級及其代表蔣介石準備最後背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事業的一種佈置。^①

2. 蔣介石抗日戰爭時期的動機“是從四大家族的財產與統治出發”，他“不打日本人”：

(蔣介石的抗戰路線，是壓迫人民的、不斷企圖與日寇妥協的、片面的消極的應戰) 蔣介石的抗戰（他本來叫做應戰）既然不是出於真心，不是從保衛民族出發，而是從四大家族的財產和統治出發，不是從中國民族、中國人民出發，而是從國際的政治投機、觀看英美帝國主義的風色出發，因此，他的所謂“抗戰”就命定是失敗主義，而且也就隨時準備相機把抗戰結束。^②

蔣介石不打日本人，專門從事反共的工作，已是天下皆知的事。^③

兩相對照，與《人民公敵蔣介石》的論斷相比，雖然《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的蔣介石仍是作為“人民公敵”、“反動政權頭目”出現的，但進步還是非常明顯的，且少了謾罵性的定語。然而，其蔣介石“投機革命”與“對日妥協”的結論，與當前學術界的研究還是有些差距的。

客觀地講，在社會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之下，主流意識形態具有宣傳教化作用的“蔣介石研究”受到了很大衝擊。主管部門已意識到這一點，正在不斷改進。“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就是從“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展而來的，其內涵與外延在不斷拓展。^④但由於主流意識形態指導下的“蔣介石研究”更多的是考慮明確的宣傳目的，對學術研究中新史料、新結論的吸納與接受較為滯後，這勢必會減弱教材普及大眾的影響力。實際上，在主流意識形態佔有廣大資源、甚至可以調控學術研究與網絡活動的情況下，即使是有明確的宣傳目的，祇要遵循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律，根據史料得出結論，而不是概念先行，也能够向科學靠攏，也能起到服衆而持久的宣傳效果。

(二) 學術研究層面的蔣介石

學術研究層面的“蔣介石”是從主流意識形態的“蔣介石”演化而來，兩者從1978年後拉開距離，漸行漸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主流意識形態主要是以“革命史觀”來指導歷史研究，評判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標準也是看其對待“革命”的態度；而學術研究不可能祇用一種史觀研究，隨着中外學術交流的日益頻繁，不少學者將“民族主義史觀”、“民眾史觀”、“現代化史觀”（包括“後現代化史觀”）、“全球史觀”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來，有些學者正是學習新史觀過程中發現以往研究中的偏差而以新研究來糾偏的。二是學術研究更遵循“論從史出”的基本原則，重視新史料的發掘與運用，實事求是。最近二十年蔣介石相關資料層出不窮，也是學術進步的源泉與動力之一。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在經過一陣熱鬧與繁榮之後，冷靜分析近十多年來對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其存在的弱點已有所顯現：多數的研究集中於具體事件的個案，過於精緻瑣碎，缺少對蔣介石的整體研究，也缺少對蔣介石與中國社會關係的研究。楊天石教授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①②③}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第25、95、127頁。

^④ 2014年5月，南京師範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開發中心與人民出版社聯合召開“第二屆中國國家歷史高端論壇”，主題是討論將大學裏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拓展成“中國歷史”。

可以說是學術界公認研究蔣介石的代表作，由近二十篇論文構成，每篇就一個相關問題進行考證或糾偏，如抗日戰爭時期的六篇分別是：“九一八事變後的蔣介石——調整國內外政策的開端”、“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日方誘和與蔣介石的應對及剎車”、“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底’——兼述蔣介石如何對待被日本侵佔的‘東三省’”、“蔣介石與史迪威事件——戰時中美之間的嚴重衝突”；他對於從整體研究與評價蔣介石的難度也有清醒的認識：“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祇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①這一目標的實現，當然需要更開放、更寬鬆的研究環境，但如果未來的研究仍陷在“碎片化”的泥沼中，學術進步就不會太大。因此，未來學術層面的蔣介石研究，一是要嚴格按照學術規範，發掘新史料，走“學術化”與“國際化”的路子，不能意氣用事地為迎合大眾“做翻案文章”；二是要將蔣介石置於中國近代社會的環境中加以考察，蔣的經歷也是大歷史中的小故事，不要孤立地評論他。

(三) 公衆網絡層面的蔣介石

蔣介石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民衆自然各有看法，套用那句“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麼應該是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蔣介石了。原本缺乏表達工具的普通民衆，得益於互聯網的便利，有了表達的“自由”與陣地。蔣介石因而成為一些歷史類、政論類論壇的重要議題，各種評價紛呈，爭辯激烈。有的“擁蔣”的言論十分偏激，卻也引來“粉絲”的好評。有位歷史學教授說過一段經歷，他有次看到網絡上一些贊譽蔣介石的言論“十分出格”，與史實相去甚遠，就登錄上去傳播些“正確的知識”，結果遭到了“圍攻”甚至謾罵。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B. Croce, 1866—1952）在寫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著名論斷時，怎麼也不會想到日後會有一個所有網民都能充當“歷史學家”的網絡時代，對歷史的感悟與書寫已不再是“學者”的專利。其實，網民根據自己的知識背景與現實處境來從歷史中找資源，臧否歷史事件與人物，正體現了克羅齊論斷的精髓與對歷史解釋的“現代性”。網民眼中的“蔣介石”，就是他們認為真實的“蔣介石”，歷史學者似乎也無權橫加指摘。

對於以網絡為代表正在興起的社會公衆對蔣介石的“熱情”，歷史學研究者應該積極介入與引導。社會公衆畢竟缺少正規的史學訓練，很少接觸到基礎史料，他們感性、從衆，甚至衝動，但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故學者不能再劃地為牢，孤芳自賞，應該在堅守基本史實的前提下，將最新的學術成果以公衆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出來，如為報紙寫通俗文章，在文史類雜誌上開專欄，幫助廣播、電視製作專題類節目，到各地圖書館公開演講等，引導社會大眾，使他們得到正確的信息，形成較正確的歷史思維。這也是公衆史學所追求的目標。

簡而言之，在對歷史的解讀與表達已趨向多元的中國，研究歷史的理念與方法趨向多元，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也呈現多元。對“什麼是最好的歷史學”的追問，祇能針對不同層次，尋找不同的標準。

[陳紅民（1958—），男，山東省泰安市人，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教育部歷史學科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歷史學科評審組成員等，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中華民國史及當代臺灣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函電裏的人際關係與政治：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研究》、《蔣介石的後半生》等。]

^① 楊天石：“序”，《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